

# 金融和技术变迁给治理带来哪些挑战

——陈介玄、邱泽奇、刘世定、司晓对话录

陈介玄 邱泽奇 刘世定 司晓\*

在人类发展史上，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都对社会和个人产生了深刻影响。技术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城市、乡村的秩序和社会结构。从典型的社会学视角来看，也改变了市场、社会、政府三者之间的联结和组织关系。

金融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从其诞生之日起，即与风险一词紧密相连。金融不仅给个体的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也影响作为总体的社会以及整个国家。这种影响，因被资本全球化的扩张所裹挟，而变得范围和深度更加超乎人们的想象。

当金融的演变和技术的革新交织在一起，这两股力量曾经带给社会治理什么样的挑战？又会如何影响未来？2018年5月27日，在北京大学“发展中的治理”学术研讨会“治理变革前沿”圆桌对话中，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陈介玄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邱泽奇，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刘世定教授，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博士给出了深入的分析。

陈介玄作为引言人，在讨论金融对社会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 金融对体制的重塑及其对治理的冲击

陈介玄认为，就金融和技术来说，社会学关注到了技术问题，较少注意到金融问题。但是金融对社会体制具有极强的影响，回头看英国300年的历史，金融革命促使英国对国家体制、社会体制、市场体制做了非常大的转换。19世纪之后，金融影响体制的力量，和技术变革的力量汇集在一起，在三个层次上对社会治理产生影响：对个人层次造成了很大的挤压；在社会层面造成很大的治理平衡问题，金融危机会对平衡的社会结构造成冲击；在国家层次，国家需要考量如何进行专业的监管，面对金融和技术的发展做出专业的治理。

陈介玄：作为引言人，我先对金融和技术的脉络做一个厘清，然后请各位就国内问题做深入讨论。今天我们讲的是金融和技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学一直在处理一个问题，就是技术问题，但我们较少注意到金融问题。回头来看这300年（比社会学历史还长150年），经济对人类社会的影 响对治理产生了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从哪里产生？我想第一个应该谈工业革命，技术的发展使得整个人类社会在19世纪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从工业革命之后到19世纪，社会的转型造就了我们现在这门叫社会学的学问。因为社会是一个总体，透过技术的革命变革，

\* 陈介玄，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871）；刘世定，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871）；司晓，腾讯研究院院长（深圳 518000）。

对产业各部门，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社会各部门，产生了一连串的影响，因此，对于治理起着非常大的推动或者破坏作用，每一个社会因为技术的改变，而产生了非常大的压力、紧张、冲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了社会学作为 19 世纪最重要的学问出现的原因，而这些问题是政治学、哲学、经济学所没有办法处理的。

但是有一个缺口我们并没有补上，这个缺口是另一个带来社会治理上最关键转折的因素，可是它不像技术那么透明，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从表象上看到的，那就是金融。

金融为什么会有很大的破坏社会既有体制的作用，乃至对治理有极大的重要性呢？我们应该回头看 300 年前的英国。卡如德（Bruce Carruthers）写了一本书<sup>①</sup>谈 1672 年到 1712 年这 40 年，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启动了金融革命。我作为社会学家了解的是，工业革命在技术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金融革命对整个社会在治理上带来的冲突。英国 300 年前的金融革命，带动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整体性的社会体制的转换。英国为了发行公债，必须向全世界的人们说明，英国有非常大的能力不毁约、付给全世界投资人利息。英国必须有一个非常好的国家体制来承诺全球的投资人，这个时候国会就取得了财政权，跟全世界背书。在这个前提之下，英国税制要改变，他首先做的是从包税和间接税改成直接税，才可以精算出给全世界投资人 5 帕（5%）利息是不是做得到，所以国税部门要成立。谁来审计这些资源呢？所以审计部门要成立。国家总体的资源应该由谁来运作？因此有财政部来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金融革命开始，英国对国家体制、社会体制、市场体制做了非常大的转换。

到了 19 世纪，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汇集。工业革命之后，技术的发展也造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讨论的核心：整个人类进入以工业生产为主导的时代。从金融革命到工业革命，从金融到技术，金融和技术这两个领域的变革造成了现代社会的演变，那么它到底造成什么样实质的影响呢？我用三个层次来说。

第一个层次是个体层次。这种变革对个人层次造成了很大的挤压。我个人经历了投资失败以后，开始思考金融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口袋里的钱，本来想要 6000 万（台币）未来变一亿两千万（台币），怎么后来都赔掉了？金融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属性？我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把教的课程改成了金融社会学。金融真的很重要，如果不懂金融，将来退休会很痛苦的（指缺钱）。时代在改变，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什么影响你的命运和生活，这恰恰是微观的个人必须面对的。所以我跟我的学生讲，什么都要学，金融尤其不能不学，攸关将来能不能过一个快乐幸福的退休生活。

第二个层次是社会本体。金融和技术的变革对社会本身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比如 2008 年，我们哪里会想到，像雷曼这样一个有 150 年历史的公司倒掉以后，对社会产生那么大的冲击，所以当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人，在面临金融和技术演变的时候，会产生非常大的治理上的问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阿里巴巴的蚂蚁金融要上市，要 IPO，它的市值一下子就冲到 1100 亿到 1500 亿美元，这么大的公司对社会的冲击是巨大的，如果有一天它产生问题，就会有风险。我们要看到在社会层面，金融和技术的演变造成很大的治理上的平衡问题，就像昨天张静老师说的，我们要寻找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的社会结构，但这个结构会受到很多力量的冲击，比如金融危机。

第三个层次是国家。2008 年金融危机时，国家变成救世主，从美国到英国甚至整个欧洲，

<sup>①</sup> Bruce C. Carruthers, *City of Capital, Politics and Markets in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所有的问题最后还是由国家来承受，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事件发生以后，整个AIG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美国国际集团）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出面融资850亿美元就垮了，而这样一个集团，在美国社会是千万家庭的保护，所有的社会保障都仰赖这个保险机构，国家要出面。所以最后我们看到，国家如何监管，国家如何面对整个金融和技术的发展，有一个相对专业的安排问题。台湾地区在这方面是倒退的。300年来英国的金融产业领导着全球，所以当国家和地区发展到要去监管、要去做治理的时候，他必须用专业的治理，这个专业到底在哪里？我想这是一个社会发展壮大的问题。300年来，从个人到社会到国家这三个层次，金融和技术的发展演变过程造成了非常大的治理上的压力，这个现象如果放在国内来看，我们要怎么面对它？在这个局势下，在理论和方法上，国家、社会、个人如何回应这样的问题？这是要求教三位的。

刘世定教授从金融对社会的影响入手，进行了讨论。

### 合约视角下的金融治理

刘世定认为，我们今天同时面对着金融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这两个技术革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今天我们面对的基本的社会状况。金融技术革命指的是金融工具的多样化以及金融组织的多样化。这导致了金融资产超过实物资产的资产结构变化，带来了基本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但是目前社会学对此回应甚少。从合约视角来看，有三个和金融有关的问题需要我们的治理面对：第一个问题，通货膨胀治理；第二个问题，金融和信息技术革命下的财富分配治理；第三个问题，对产权保护的治理。

刘世定：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讲的治理的概念，是指在合约视角下的治理。研究治理有不同的视角，有制度视角和非制度视角的区别；在制度视角之下，又有制度环境视角和合约视角的区别。我们在这里是从可以选择的合约这一视角去研究治理，特别关注的是和金融有关的合约视角的治理。治理有很多的维度，比如治理目标、治理手段，合约视角的治理关心的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选择什么样的合约形式能够达到相对良好的治理结果。我这个发言有一个基本假定，那就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会继续，相应的金融结构的变化会继续，在国际范围内，信息和金融的半开放状态也会继续。

我们今天面对着两个技术革命，一个是金融技术革命，一个是信息技术革命，这两个方面交织在一起，为我们今天面对的基本社会状况增添了新的内容。在这里主要谈金融技术革命。金融技术革命指的是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发展，比如股票、债券、衍生品、期货等等工具的多样化发展，以及金融组织方式的多样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金融工具就是货币，金融组织主要就是银行，但今天已经不是这样了。其中一个标志性的转折，是金融资产超过实物资产。从国际范围来看，据戈德史密斯的统计计算，1900年，美国的金融资产总额（包括债权和公司股票总额）占国民财富总额的67.0%，而到1963年，这一比例变为124.9%，金融资产超过实物资产；据美国麦肯锡顾问公司全球研究所研究员布赖恩和法雷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研究，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流动金融资产，比实体经济增长的速度快三倍。<sup>①</sup> 在中国，根据易纲教授等人的

<sup>①</sup> 雷蒙德·W. 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周朔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第7—10页；洛威尔·布赖恩、黛安娜·法雷尔：《无疆界市场》，汪仲译，台北：时报出版社，1997年，第27—28页。

统计, 1991年中国的金融资产大约是实物资产的200%, 到2007年, 这个数字到了400%。<sup>①</sup>也就是说中国最近40年来, 伴随金融工具和金融组织的多样化, 金融资产大大超过实物资产。资产结构的变化, 带来了基本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但到目前为止社会学对此回应甚少, 我们今天研究社会分化的时候, 注意力还在制造业里面的雇主和工人的关系, 事实上, 在这样一个大的结构变化下面, 主要的社会分化是通过金融手段来实现的, 很多实业资本的利润率很低, 许多从事制造业的企业主只是中产者。对于社会学来说, 这里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结构性变化是怎么产生的? 它有什么样的特征? 会引发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有一系列的基础问题需要我们去解答。在治理方面, 也带来了新的特点和问题。另外一个革命是信息技术革命。这两个革命交织在一起, 一方面使金融工具、治理方式得以发展。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一些信息技术对金融技术推动的实例, 如, 电子支付方式、电子货币等, 这也是对治理方式多样性的推动; 另一方面, 两个技术革命的交织, 也使更加复杂的金融活动中潜伏的问题一旦爆发, 会通过新的信息技术迅速扩散。有时可以看到, 投资者似乎没有犯任何错误, 几千万资产几分钟时间变成一堆废纸。金融和信息技术连在一起, 使得经济、社会问题的扩散之剧烈远超人们以往的想象。这些是我们看到的新的力量, 它们构成了今天考虑治理问题的大的社会背景。

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也是人们之间从事经济活动时的合约。人们在经济活动中选择不同的金融工具, 也就是选择不同的合约方式来从事治理。在金融技术革命的条件下, 从事企业经营若不懂得如何运用、组合不同的金融合约治理, 就如同跛脚行路, 难以取得良好成效。我们也注意到, 在金融技术革命的冲击下, 一些从事实体经营的企业弃实体而转向金融投机, 这一现象多少反映出经营者在某种迷茫情绪中的不知所措。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 有几个和金融有关的问题是治理需要面对的。

第一个问题, 通货膨胀的治理。在政府掌握货币发行权的条件下, 通货膨胀的操作性根源在政府。由此来看, 所谓通货膨胀治理也就意味着政府与民众之间采用怎样的合约更有利于实现怎样的经济、社会目标。这里存在着不同的治理方式(或合约)可以选择。比如, 政府承诺价格指数控制上限、立法机构事先确定货币发行规模并公布于全社会等, 就是不同的治理方式。在怎样的条件下, 不同的治理方式会带来怎样的不同后果, 是通货膨胀治理需要研究的。如果给定经济、社会目标, 则通货膨胀治理需要研究在怎样的条件下, 何种治理方式具有相对优势。

在简单的经济学模型中, 给定可购买的实物品, 则货币投放量的大小可以灵敏地在实物品的价格上体现出来。但在金融技术革命的条件下, 金融工具多样化导致一个复杂的金融池的形成。包括货币在内的诸种金融工具在金融池中交易、滞留, 财富在金融池中再分配, 人们在金融池中伴随财富的增长与消减而感受满足和挫折。这也使得货币向实物品的流动有了更多迟滞性因素, 因而使实物品价格的灵敏性下降。这里潜藏的一个危险是, 如果货币发行者仅仅依据实物品价格判断货币发行量的适当程度, 可能产生错觉, 甚至过高估计金融池对实物品价格的缓冲力量。事实上, 如果金融池蓄不了了, 里面的钱涌出来, 通货膨胀就会爆发。金融池的结构问题和金融池崩溃的边界问题,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社会治理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金融和信息技术革命下的财富分配治理。伴随着金融技术革命, 金融资产超过实物资产成为基本的社会结构特征, 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化机制和后果。信息技术的发展, 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金融结构对财富分配的影响。财富分配是通过金融机制和信息技术的变化两个方面的结合来实现的, 由此也产生了对财富分配的治理问题。在金融技术革命的条件下, 财富

<sup>①</sup> 易纲、宋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 1991—2007》,《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

分配的不平等常常也伴随着金融合约实施而产生。对严重的不平等加以治理，如何在合约机制下进行，需要深入探讨。

第三个问题，对产权保护的治理。我们知道，货币发行是一个隐蔽的税收方法，发行货币多了，实际上是稀释了社会成员所有的财富，实现了人们没有察觉到的产权的转移，所以不少国家对货币发行有非常严格的监控和制约措施，但在中国，制约和监控措施目前还不是特别严密周全。另外，在新的条件下，电子货币出现了，央行也正在研究。电子货币的发行比纸币的发行隐蔽性更强，货币的资源提取权特征更加凸显，而外在的物化特征更加淡化——社会成员往往是通过外在的物化特征间接监督货币发行。这就提出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怎么样保护居民的产权不受过度发行货币之害？这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治理问题。从治理的合约视角看，需要形成一系列的社会合约。

在金融板块之后，邱泽奇就技术对社会治理的影响给出了分析。

### 技术能力对治理的挑战

邱泽奇认为，如今面对的、最直接的治理问题是，技术迭代的速度远远快于人们行为改变的速度，更加快于社会规则变化的速度，使得技术携带的规则开始凌驾于人类社会规则之上，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技术化的时代，进而在技术与治理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使得治理面临两面作战的挑战，一面是技术治理的挑战，另一面是社会治理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利用流动的数据资源为个体行动提供平台、塑造个体行动的场景，进而满足社会需求；而政府尚缺乏能力利用数据资源监管市场，技术快速迭代导致了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失衡。这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

邱泽奇：今天的社会生活已经离不开技术，尤其离不开信息技术。技术从曾经的工具，变成如今人们的依赖。在中国，即使在偏远的地区，哪怕只会用几个按键，人们都在用微信、玩抖音。信息技术应用给社会带来了一场狂欢式的盛宴，从老到少，从男到女，从城镇到乡村。当然，信息技术应用带来的不仅是娱乐，更是一个巨大的、不断出现的、让人们难以想象的机会，各种意义上的机会，当然，也是社会发展的机会。

在盛宴和机会的背后，令人不安的是技术快速迭代和治理机制缓缓前行之间的紧张。技术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层出不穷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应用已经让我们无需专门寻求证据，每一个人几乎每天都在感受技术迭代带来的影响，以社会化应用的通信技术，从传统的电子邮件、BBS，到博客、微博，再到微信、抖音，技术的迭代是以加速度方式展开的。问题是：（1）人们行为变化的速度是缓慢的。人的社会化过程漫长且缓慢，习得的社会规则与行为习惯又带着与生俱来的惰性。切入点的差异使得代际之间的技术应用能力呈现出逆向展开模式，即越是年轻人对新技术的掌握速度越快，进而让技术的新旧变成了区分技术能力的工具，大众被技术甩出了当前的时代。（2）治理机制的变化则更加缓慢。一个社会普遍接受的制约机制，需要覆盖最广大的社会群体，也意味着要覆盖多代人的行为，既涉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又要照顾历史形成的文化与习俗。因此，推动规则变革更加困难，治理机制迭代的速度相比人们的行为和习惯，还要缓慢。

尽管人们的行为习惯、社会治理机制都在变，社会发展在加速，<sup>①</sup>可是，迭代速度差异带来

<sup>①</sup> Hartmut Rosa and Jonathan Trejo-Mathys, *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的后果依然是，技术规则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引领或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以知情同意为例，在座的各位，你们在使用手机应用时，是不是会遇到在安装或使用中都会弹一个窗口要求你同意这同意那？问题是，你能不同意么？尽管你并不清楚甚至完全不清楚条款的具体收益和风险，可是你却不得不同意。不同意，就会停止安装或不能使用。这意味着技术规则开始凌驾于人类社会规则之上，技术在左右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人类进入到了埃吕尔说的技术化时代。<sup>①</sup>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治理实践中，我们还不得不用传统治理机制来面对技术快速迭代提出的治理需求，让治理面临两面作战的挑战。

第一是技术治理的挑战。技术快速迭代意味着技术能力的不断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例，从中国第一个门户网站诞生到现在，不过短短 20 年的时间，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生产活动的技术化到社会生活的技术化，技术化几乎无处不在。

社会技术化后果之一是产生了技术野性，也可以称之为技术暴力，即技术的部分属性不再接受社会规则的约束，暗网（dark net）典型地来自技术野性。对抖音的沉迷、对游戏的沉迷，在广义上，也可以被认为是技术野性的后果之一。

理论上，技术无所谓善恶，把技术用于不同的目的才产生了善恶。一个近期的例子是，2018 年 3 月 17 日出版的《卫报》刊登了英国数据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前雇员瓦力（Christopher Wylie）的爆料说，公司窃取了脸书（Facebook）5000 多万美国用户的个人资料，为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创建了分析和预测用户政治倾向的程序，采用精准投放模式操控潜在选民的投票，影响了 2016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公司此前还影响了英国“脱欧”进程。

如果说剑桥分析是对技术恶的应用，那么，对技术的善意应用也可能为恶的应用提供机会，进而给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近期，一份志愿者的报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6500 位使用芬兰波拉（Polar）公司穿戴式健身手表的人士在锻炼身体时的数据，被挖掘出了超过 200 处机密坐标，其中包括 125 处军事基地、6 处无人机基地、18 处情报机构、48 处核武器存放点，还包括美、英、法、俄、荷等国家的军方人士、情报人员的姓名和住址。<sup>②</sup>

技术快速迭代产生的后果不单纯是一部分社会成员被甩在了技术以外，更重要的是它为技术挖掘带来意想不到的机会。这些机会既可以用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对技术的治理正是约束技术使用的目的和范围。游戏给我们带来快乐，抖音给我们带来了展示舞台。可如何在带来快乐的同时不至于沉迷？如何让舞台上的展示给社会带来积极而不是消极影响？让技术携带防御机制、防止技术为恶所用，便是技术治理的重要议题。

问题是，既存的治理机制尚缺乏治理技术的能力。一个典型的中国例子是网约车。2001 年中国出现第一家网约车平台，一种新的技术应用。在随后的 5 年里，网约车表现为无规可依状态，在业界被称为野蛮生长。2016 年 7 月 28 日，中国颁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为网约车监管制定了规则。问题是，《办法》甫一出现，便在社会上引发了轩然大波，涉及的每一个利益相关方都不满意，直到今天，规则虽在，可是有规难依。

无规可依和有规难依都意味着对技术治理的失灵。在技术能力几乎无孔不入的时代，对技术治理的失灵不仅发生在中国，世界皆然，波拉项目（Project Polar）就是很好的例子。对此，世界各国都在努力，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尚没有有效的实践。譬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争议，美国《网络中立法案》（Net Neutrality）的存

<sup>①</sup> 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Translated by J. Wilkin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4.

<sup>②</sup> 可以查询“Project Polar”，参见 <https://decorrespondent.nl/8482/>.

废同样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中国的信息技术应用走在世界前列，面对的问题更多，机会也更多，对治理技术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机会去尝试，以期为人类社会的治理作出贡献。

第二是社会治理的挑战。理论上，对技术的治理也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对技术的治理在于从技术源头上设置机制，防止技术作恶，针对的是技术自身逻辑；对社会的治理则关注在给定技术下，设置社会机制，防止人们运用技术作恶，针对的是技术的社会逻辑和技术应用群体。

从总体上看，技术应用群体可以被分为三类：政府、市场与社会。在技术应用中，三者之间又有着微妙的关系。譬如玩抖音、玩游戏，看起来是一个技术的社会应用，背后却与技术的市场应用紧密相连。抖音、游戏是市场提供的，开发抖音、游戏的技术也是市场提供的。但两类技术的来源存在差异，<sup>①</sup>所以后者涉及对技术的治理，前者则涉及社会治理。

比如现在正火爆的抖音，几岁的小孩喜欢，老太太也喜欢；城市的人喜欢，偏远区域的人也喜欢；其流行速度之快、覆盖范围之广，是任何传统产品无法望其项背的。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可以这样？回答好这两个问题，才可以为社会治理找到着力点。

直接的答案是：数据技术的市场应用。

信息技术发展的直接后果是让数据成为影响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数据技术则为使用资源提供了直接的工具。对数据技术的治理，需要约束数据的搜集范围，譬如波拉项目，最终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迫使波拉公司关闭了定位共享功能。而数据技术的普遍使用给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则是如何约束数据的使用范围，约束人们包括市场使用数据作恶，譬如约束使用网约车犯罪。

数据来自于社会。在座各位，每个人都在使用智能设备，各种场所也有设施和设备。这些设施和设备都有搜集数据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既与满足用户的需求相关，又与提供服务的设施相关，且通过整合已有的数据来满足用户的需求。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又向设施发送数据。如此，用户的需求与满足都变成了数据，也变成未来感知用户需求、满足用户需求的数据。就这样，技术在人类的需求与服务满足中建立一条永不枯竭的数据河流网络。

数据用于市场，甚至政治。每一个物理的个体通过诸多传感器汇集数据，便有了另一个个体，即数据化的个体，如健康状态、工作状态、饮食起居，甚至口味、色彩偏好，都被汇集在数据网络中。对数据挖掘，不仅可以知道你的阅读偏好，也可以知道你对服装的款式与色彩偏好，政治机构甚至用它来操纵你的观点，激发你的某类情绪。当然，数据也可以用于满足个体需求，既包括积极的如约束个体野性与邪恶，也包括消极的如放纵自己的欲望，从身体到心灵。抖音、游戏，只是市场用数据满足个体消费相对中性的例子而已。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市场对社会的影响曾经是缓慢的、分群的、局部的，社会对市场也曾经有着强约束，尤其在市场违背一般社会规则时，譬如在儿童和老人身上赚取暴利。可如今，市场对社会的影响是涌现式的、不分群体的、广覆盖的，一个抖音，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与此同时，社会对市场的约束却呈现出日渐衰弱之势。在市场与社会的天平上，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以至于直接操纵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技术快速迭代导致的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失衡在更抽象的层次上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挑战：如何治理一个充斥着技术的社会？

<sup>①</sup> 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曹东溟、王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

数据当然也可以用于社会治理。我想先举一个例子，我观察到的例子：基层政府的智慧治理。

数据资源的魅力既然吸引了市场和社会，自然也吸引了政府。从村居到中央，都希望运用数据资源，实现智慧治理。不过，在基层，基本的做法是设置各种高清视频监控摄像头，希望覆盖人们的吃、住、行、消费、娱乐，掌握每一个人的行踪和动态，从而实施治理。

理论上，现有的技术可以搜集任何场景的数据，包括卧室里的数据。技术的可用性给政府带来一个幻觉：数据就是治理。部分政府官员认为，只要有所有场景的数据，就可以实现机器对人类行为管理的自动化。有人做了一个类比，云计算类似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物联网类似于感觉神经系统，工业 4.0 类似于运动神经系统，人工智能类似于城市智慧，由此形成了两个神经交感系统，第一个是大社交形成的神经元网络，第二个是云脑形成的云反射弧。神经系统、神经元网络、云反射弧，自然地构成了快速社会治理的反应系统、一幅非常完美的智慧治理图景，不是吗？

其实，在这幅完美图景里有两个非常大的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把社会治理等同于监控。以监控为基础的治理，还是传统治理。第二个是把社会治理等同于机器代替人进行治理。

现在，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对治理进行厘清。刘世定教授对治理有一个定义，我对治理也有一个定义。在语源上，治理来自于希腊文，即使在基本含义层次也饱含争议；<sup>①</sup> 在中国行政实践中，经历了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sup>②</sup> 在日常社会实践中，治理其实是达成社会秩序的社会机制。简单地说，就是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模式，既作为名词，也作为动词；还内涵不同的层次，从国家治理到基层治理。

任何社会，治理本身不是目标，治理的目标是建构基本的秩序体系。秩序体系到底是什么样子？需要有一个社会共识，即社会机制，我在这里讨论社会治理，前提是在给定的条件之下。

给定条件是什么呢？条件是，用于治理的数据可以和用于市场的数据一样丰富。问题在于，市场有能力运用数据、也运用技术挖掘社会需求、满足社会需求，甚至可以不顾基本社会规则，获取巨大的经济收益；政府却缺乏能力甚至还没有转变观念想到运用数据、运用技术挖掘社会需求、服务社会需求，甚至对市场作恶一无所知，甚至也没有能力对新的市场进行监管以保护社会的利益。

这才是对社会治理最大的挑战，也是这个时代的呼唤。

在政府没有能力、社会没有能力治理的条件下，面对市场作恶，谁来治理呢？靠公司自己吗？谷歌曾经说过，谷歌不作恶，就是最大的善，脸书也讲过同样的话。在我们这样一个技术化的社会，脸书可以自己不作恶，却不等于其他公司不利用脸书数据来作恶；波拉公司不作恶，不意味着社会中任何力量不利用波拉公司的数据作恶。如今的社会治理，不仅是要抑制剑桥分析的行为，遏制政治操纵、社会操纵、金融操纵，甚至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操纵，还要遏制运用人们日常生活产生的数据启动核武器，它关乎整个人类的命运。

这是不是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历史转型？从中国早期的皇帝统治，从欧洲早期的贵族统治，转向资产阶级统治，现在转向精英寡头统治？不是！技术快速迭代与社会缓慢前行之间的张力正在形塑这样一种格局：技术能力正在进入无人之境，创造和掌握技术能力的人群制定规则，

<sup>①</sup> Henrik Paul Bang, *Governance a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sup>②</sup> 李培林：《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技术力量没有受到社会约束，不仅是技术的市场力量没有，技术的部分社会力量和技术的部分政府力量也没有受到社会的约束，这是治理面对的真正挑战。

面对这样的挑战，对解决方案的搜寻还需要回到社会来。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譬如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最近发表一篇博文呼吁，为了帮助社会各界适应科技的快速发展，政府是时候对人脸识别进行监管了。<sup>①</sup>

针对邱泽奇提出的问题，司晓回应了平台在第三方行为中的责任的看法，并谈到了如何将技术应用于治理。

## 平台的责任以及技术在治理中的应用前景

司晓认为，根据交往安全保障义务理论，互联网平台在条件满足时需要为第三方侵权行为承担责任，这也是有国际判例可循的。面对人们对技术监管的担忧，企业可以协助政府将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应用于治理，但应保持数据匿名化使用、提供公共服务和不触碰用户个人信息之间的平衡性。在技术应用方面，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甚至区块链等技术方式正在使得社会治理产生一些新的变化，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更多空间，我们需要抓住技术参与社会治理的机遇，而非简单出台法律规章。

司晓：我自己是法律背景，跟治理关系很密切。我先解释一个问题，平台为什么要为第三方行为承担责任。对此，学界有很多理论，包括危险责任理论、报偿原理说、控制义务理论以及普通法上的“深口袋理论”<sup>②</sup>等，但都不足以解释平台责任。我认为交往安全义务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什么平台要为第三方行为承担责任；交往安全义务理论源自于德国的相关判例，在某个案例中，消费者在舞厅里面被外来的人员打伤了，舞厅保安没有出手制止，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所以舞厅要为这一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换句话说，如果你搭建了一个商业场景，创造了一个交往的环境，然后在其中产生各种商业行为、商业互动，能够给你带来一些衍生的商业利益，你就需要承担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将这个理论应用在互联网上，其实是既形似又神似的。就形似而言，互联网也创造了类似的空间，无论是电商平台如淘宝，还是微信里面的各种群组，抑或其他各种各样的网络空间。当然，网店和群组不太一样，后者是不能进入观察的。不管怎么说，这个理论给平台为第三方行为承担责任找到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这个是神似的。

第二个问题，技术对治理的影响。很多人都有过这种体验，在政府机构窗口办事的时候，同一件事常常要重复提交很多复印材料，但其实这些材料早就数字化了，政府的不同机构都已经收集到了，如果用电子化方式来做能实现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在“互联网+政府公共服务”方面所做的努力。比如数字广东项目，腾讯通过和运营商共同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去改造整个政务服务系统，还有就是微信里面的城市服务，此外腾讯也在和其他地方做类似的尝试。在技术的驱动下，各地政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更多关注用户体验。这些都是积极的变化，而我们还需要更多地思考如何利用技术实现治理、政务的转型升级和效率质量提升。我们也在

① 一部分内容（包括此内容）为讲者在成稿时补充。参见 <https://blogs.microsoft.com/on-the-issues/2018/07/13/facial-recognition-technology-the-need-for-public-regulation-and-corporate-responsibility/>。

② “深口袋理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论证为他人行为负责，尤其是雇主责任的理论依据，也被称为“公共政策理论”。法律政策从保障受害人的角度出发，要求由具有更强赔偿能力的雇主承担责任，这是源于公平和社会秩序的需要以及满足最朴素的正义。

尝试用大数据做一些场景化的应用，比如上海外滩曾发生过一次严重的踩踏事件，如果能够根据 QQ、微信用户的数据，甚至集合滴滴、摩拜等服务商的数据，来实时预测城市人流密度并预先采取措施，可能就会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在隐私方面，大数据应用在提升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注重数据的匿名化使用，同时也平衡个人隐私保护，不触碰用户个人信息。我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腾讯地图平台上，以及我们合作方的平台上，用户每天主动上报数据，比如使用滴滴打车或者通过微信查找附近的人的时候，用户需要把自己的位置信息告诉平台才能进行相应的匹配。这种位置信息的记录是暂时的，使用者也可以在终端设备上把这种位置信息清除掉。我想说的是，这种主动的位置上报虽然没有那么实时、准确，但是如果事后用来分析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人群特征，包括年龄阶段等，就可以做出一个大概的预测模型，把这个工具应用于全国范围内，如果在同样面积的区域聚集了同样类型的人群，在同样短的时间内，发生恶性事件的概率就可能很大，就可以给公安预警，公安就可以派出警力去疏散，如果不疏散的话可能十次顶多发生一次事件，但是我们要堵住的就是那一次。这是大数据应用于社会治理的一个例子，滴滴和摩拜等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辅助交通、优化交通等方面也都做了很多尝试。

还有一些大数据应用是大家都用得着的，实际上也是群策群力的典型。比如，用户都用一些软件对骚扰电话进行拦截和标注，是疑似诈骗的还是传销的，大家都把数据贡献出来，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模型计算出某个号码大概有多大的概率疑似诈骗或疑似传销，如果概率很大，就会采用一些办法使这个电话接通的机会大幅度下降。另外，在城市治理、村落治理中，完全靠政府的力量是比较难的，但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手机、人人都能互动的情况下，可以形成一个所有人都参与绘制一个备忘地图的机制，随手拍违章就是这样的形式。全民共治在社会治理方面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路径。

技术应用于治理，以上我讲的大数据可以说是现在发生的，未来可以做得更好的，但是区块链技术是一个和社会治理有关的更具有超前性的话题，我们需要以一个比较长远的眼光来看它未来的发展。

第 8 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经说，腐败问题的猖獗已经导致 30% 的救援物资无法送达最终目的地。联合国有 193 个成员国在资助，联合国希望通过区块链的技术记录资金的去向，提高资源分配的效率，这样一来，捐款者变得更愿意出钱，这是区块链在公益场景下的一个使用。简单来说，区块链就是一个分布式的记账系统，像比特币和以太坊就是已经出现的应用场景和平台。区块链建立了一个去信任、去中心化的模式，它是透明的、不可篡改的，要改变区块链的记录需要控制至少 51% 的节点。

那目前区块链技术在治理领域或者公共服务领域有哪些应用呢？在公共服务领域，区块链主要围绕四个类型开展：身份验证、鉴证确权、信息共享以及透明政府。比如，在身份验证方面，爱沙尼亚和波兰为居民建立区块链身份，提供出生证明、结婚证明、商务合同、公证等服务；英国、瑞典、洪都拉斯、格鲁吉亚、巴西在产权、土地登记方面有一些例子，即用区块链记录、追踪房产、土地交易；中国在版权交易、社会福利、公益方面有一些例子，比如中国版权局下属机构开始推进区块链版权交易；在海关、物流方面，新加坡用区块链技术记录交易装货清单，保护进出口货运公司免受诈骗银行之害；在社会福利方面，英国用区块链记录福利支付，养老金兑换，减少社会安全诈骗。这些尝试希望用这种去中心化、去信任化的方式，没有人为干预可能性的方式，建立更加稳固可靠的记账系统。

世界各国都在对管理和治理进行改革。治理并不是简单出台规章条例，而是一种逐步变化

的过程。如果说大数据的方式、移动互联的方式，已经使得社会治理产生一些变化，那么区块链技术为公民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提供了更多想象的空间，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期待。

邱泽奇：（回应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曹正汉教授问题“区块链技术能够帮助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与公共事务治理，甚至帮助社会去中心化或者说社会自治。那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政府想要监管或控制。政府有办法控制区块链技术吗？或者说，政府有办法把区块链技术控制在主要实现政府的目标上吗？”）

区块链长远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无政府的社会，但是区块链技术有一个基本的假定是错误的，它假定每个人面对技术的能力是一致的，这个假定过去不存在，今天不存在，未来也不存在。正因为每个人面对技术的能力有差异，政府才具有意义，否则政府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正因为每个人面对财富的能力有差异，金融监管才有意义，否则金融监管也没有意义。我认为，必须承认个体之间在能力、知识以及其他一些特定维度上的差异性，差异性是人类固有的属性。如果这个属性没有了，区块链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司晓：（回应曹正汉）我认同邱教授的说法。现在区块链技术的鼓吹者会比较多地强调区块链技术的愿景和未来，但是人类的个体差异始终是存在的。有人认为在所有场景下都实现去中心化而社会还能够正常运转，说实话我认为这不可能。人们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可以借助区块链技术，实现去中心化，降低交易成本。在法律领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智能合约的引入，利用区块链技术，使得合同条件的达成和合同本身条款的维系和执行变成完全自动化的过程，因为区块链体系决定了智能合约是不能篡改的。所以，在一些能够被量化、能够被技术控制的场景，合同的执行就是系统化、自动化的，就少了很多需要到法院解决的纠纷，纠纷解决成本大幅降低，但是确实不能在所有场景下都实现完全自动、自理的状态，不过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厂商投入区块链的开发应用，未来还是有更多的应用可能。

邱泽奇：（回应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徐勇教授的评论“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新的依赖关系，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到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现在到了人对技术的依赖关系，这是我们治理需要注意到的。”）

徐教授提的，也是我想谈的。面对一系列技术带来的挑战，我们都没有答案。公司是否作恶？政府是否作为？个人是否抵抗？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技术快速迭代带来的挑战。就像司晓院长说的，企业在学习，个体也需要学习。技术给每个人提供了想象自己世界的工具，每个人正在这么做。问题是，你想象的世界，不一定是你生活的世界。把这两个世界结合起来，才是我们走向技术治理的可行途径。

（本文由编辑根据“治理变革前沿”圆桌对话内容整理并经讲者修订补充而成）

〔责任编辑：李文珍〕

## ABSTRACTS

---

### The Changes and Frontiers of China's Social Governance

• 4 •

Editor's note :

In the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society has undergone dramatic changes. Under the changes and impact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how do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society, and the country manage themselves so that the entire country and society can respond to new problems, new conditions and new situations brought about by development? Thus, it ha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closely related to every individual in society to meet the goals proposed in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 "From 2020 to 2035,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system of and capability for governance will be basically achieved, a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will basically take shape, and society will be full of vitality, harmony and order." "From 2035 to the middle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system and capability for governance will be achieved."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topic "the changes and frontiers of China's social governance" is introduced in this issue, which is based on the round-table dialogues on "China's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frontiers of governance reform" in an academic seminar on "Governance in Development" organized by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ociety and Develop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 on May 26-27, 2018.

In "The Changes and Context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A Dialogue," Li Lianjiang,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Zhang Jing,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 Peking University, Liu Shouying,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Ying Xing,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Sociology a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ort out and redefine the concept of governance. Ying Xing has summarized five general clues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in China's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past 40 years. In terms of urban governance, Zhang Jing believes that organized relationship in China have change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organizations outside the system emerged but the established system has a low degree of integration with the members and organizations outside the system. This poses a challenge to social governance. Liu Shouying offers his understanding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core issues in rural governance, and the structure of rural order.

In "Challenges Posed by Financial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to Governance: A Dialogue," Chen Jiexuan,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 Tunghai University in Taiwan, reviewed the reshaping effect of finance on system and the impact of finance on governance at different levels. Liu Shiding, profess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ociety and Develop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 argue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acts, three finance-related issues on governance merit our attention: inflation control, wealth distribution in the context of fina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Qiu Zeqi,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the Changjiang Scholars Program and profess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ociety and Develop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 argues that the rapid upgrading speed of technology faces governance with dual challenges, namely technology governance and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imbalance between market and society is also worth noting. Si Xiao, dean of Tencent Research

• 125 •